

电影队的队长在喇叭里喊:为了祝贺村里三个孩子同时金榜题名,村里连放三天电影

但是,一个人的自我是由他人的话语建构起来的

我的高考往事

□鲁先圣

自己的长相

□曾园

读书的时候,我去过广播电台兼职,无论如何表现都会受到门卫的刁难。每次填写登记表非常憋屈,我必须想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发现有个女生从来不填写登记表,每次都是点点头就进去了。我向她请教,她开心地坦然地倾囊相授:“要跟他打招呼啊!比如看见他在吃包子,我会说‘老师傅好香’,他会很开心的!”但事实上她很少打招呼。而我努力打招呼的结果被证明仍旧是徒劳的。后来,我去税务局办事,惊讶地发现门卫在众多陌生人中点出我,让我填写登记表。

当然,看官会联想到,笔者的长相可能有些穷凶极恶。我也曾长久地凝视镜中的自己,却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镜中的我,先不谈俊或丑,但可以说并不凶恶。说有些和善也不为过。

但是,一个人的自我是由他人的话语建构起来的。有一次我坐长途客车离开武汉,大巴在傅家坡附近被截停了,车的前后左右都站着人。来人以犀利目光快速扫视全车乘客,其中一人直接走到我面前,上下打量我,让我拿出身份证。我有意缓慢地照做了。他一只手拿着身份证,对照我的脸,看了三次,还给了我。整个行动的重点在于,他们只看了我一个人的身份证。在继续开动的大巴中,我明白了:一个与我长相类似的人,恐怕是犯下了重罪。我在大脑中微弱地形成一个观点:无论一个人做出了怎样伤天害理的事情,都跟他的长相没有关系。大巴启动了,不知为什么,我不敢在全车乘客的目光中侧过头在玻璃窗中观察自己。

我在昆明工作过两年。记得下飞机不久,我就去买手机卡。小店里的姑娘微笑着拒绝了我的100元。姑娘年纪不大,但有一双已经看穿一切的眼睛。我转身就走,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从阴暗处站出来叫住了我,看样子还愿意多给我一个机会。她用质朴善良的声音说:“小伙子,你说说你的钱是哪里来的?”我的钱是刚刚从柜员机来的,但我不想说这个。我知道,中年妇女更想通过我的言谈举止来判断钱的来历是否正当。我非常清楚,我的言谈举止不可能通过她的那双浑浊的慧眼。

离开昆明之前,朋友老张告诉我,领导老胡对他讲,原来老曾说的话都是真的啊。老张说,他一直说真话啊。老胡说,他们单位的人没什么人相信他的话。我非常感谢他。但我也明白,别人不相信我,可能在我开口之前就已成势了。但其实我也在反向审视他们。不相信我的人看我的时候,在眼神、表情上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犹疑、彷徨。我能很容易辨认出来。

这种精心培养的能力结果在广州被证明无效。我逐渐发现,广州人都相信我!经常有人谈到广州的包容,其实就是对可疑长相(姑且这么说吧)不作有罪推定。这一刻我释然了,并非我的长相有什么问题,而是某些蔓延泛滥的疑心病选中了我。

后来,我的长相有了另外的特点:我是一个令人放心的倾听者。在元宵节的坛公园,一个北京中年妇女推心置腹地向我抱怨这些天公园管理措施的不到位。在护国寺小吃,一个“老炮儿”低声评论前面的“臭外地”,我一声不吭,汗都下来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变得越来越可信了。每次乘机,工作人员大多会建议我选择应急出口座位。按照航空公司的规定,他们一般会把这个位置安排给那些身强力壮的人,老弱病残孕幼、醉酒、行动不便等特殊旅客不会被安排在这个位置。在执行的过程中,他们会进行目视评估和口头评估,看乘客是否“兼具体力和灵活性,视力听力、口头传达能力如何”。我的感觉是,他们严格挑选的是有理性及可信之人。

我很欣赏自己的长相所经历的一切,我不抱怨,我本人对此完全没有作任何努力。

虽然过去40多年了,但当年的高考依然历历在目。

1982年7月6日,母亲早早起来做好了早饭,因为这天我和弟弟要去县城的县一中考点参加高考。那一年,我们村参加高考的共三个人,我考文科,弟弟和同村的另一个同学考理科。

我们读的中学是县二中,坐落在距离县城25公里的镇上。尽管那一年我们三个人都接近20岁了,但都还没去过县城,只是听人说县城在南边,坐公交车可以直接到达。

母亲给我们煮了鸡蛋,冲了鸡蛋茶,准备了三天的干粮。然后我们就各自背了一床被褥,在早上6点半准时到达了距离我们村2公

里的公社驻地汽车站。汽车站发往县城的客车一天两班,早7点和下午3点。因为下午要认考场,还要去一个在旅馆工作的亲戚那里投宿,我们就必须赶早的车。

客车是那种前些年在城市里也常看到的大通道两节车厢,开起来以后呼呼作响。我们都是第一次坐这样的车出远门,感觉开得快,汽车在中间停了很多次,上上下下了不少人,一个多小时以后终于到了县城。

亲戚是我们村本家的女婿,在县城的汽车站附近的旅馆工作。他很客气,但他只能给我们安排一张床。我们很感激,能够在旅馆里住就知足了,好在我们都很瘦小,

三人挤在一张床上勉强还可以躺下。下午一路问着去了一中的考场,对照着准考证认好了自己的位置,然后就在县城大街上闲逛。

高考连续三天,我们每天一早去考场,吃从家里带的干粮,晚上去旅馆睡觉。考试结束后还是坐那种公交车回到村里。父亲在村口等着我们。我们都感觉考得不错,就这样告诉父亲。父亲很激动,他说,要是你们真的都考上,咱村就放电影!咱村从1949年以来就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没有一个人吃公家饭。但是我们没有十足的把握,毕竟只有百分之五的升学率,考上的概率很小啊。

从考试结束到公布成绩是20天的时间,在这20天里,我们三个人每天都在一起。我们往往在不自觉中走到村口的路上,我们知道,如果考上了,学校会派老师来通知我们,老师就会在这条路上出现。

在7月的最后一天,已经是晚上的9点钟,我们的历史老师王继安骑着自行车从学校来到了我家。他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我们三人都金榜题名!

立刻,我家沸腾了,我们那个胡同沸腾了,我们整个村子沸腾了,我们整个村子沸腾了。父亲赶快杀鸡,母亲在厨房里忙活起来,说什么也要请老师喝酒。老师说,我知道这几个孩子每天都睡不好觉,刚刚知道分数,我就立即赶来了。一整夜,

父亲,叔叔,同学的父亲,老师,我们三个,还有我们村里所有的乡亲,都陶醉在无限的喜悦中。

次日,父亲和叔叔,还有同学的父亲,去我们学校,把我们的任课老师请到了一家饭店。

晚上,父亲果然把公社的电影队请来了我们村,而且,电影队的队长在喇叭里喊:为了祝贺村里三个孩子同时金榜题名,电影队在村里连放三天电影!

连续三天在一个村里放电影,这是何等的荣誉!三天三夜,我们村就像过年一样热闹,到处荡漾着欢声笑语。

莫言是聪明的,他给予葛浩文“随心所欲”的权力

不懂外语的翻译家及其他

□徐志啸

说到林纾,人们首先想到的,大约是他的翻译家身份。经他之手,问世了170多种文学翻译作品,其影响波及面之广、之深,至少近代翻译史上无人可及。但这既是在文坛上声名远扬的缘故,也是他遭当时和后人诟病或质疑的原因所在——他不懂外语,一个不懂外语的人,居然被称为翻译家?

是的,林纾的翻译家名号,说起来确实令人难以置信,其别具一格之处在于,他的所谓翻译,是由懂外语的他人口述,林纾自己负责笔录,而后修改润色——译文实际是两人合作的结果。正由于此,一般人乃至翻译界对他都有些不以为然而。

但是,林纾的功绩真的无可置疑,他确实在近现代的翻译史上树立了一块丰碑。钱钟书十分肯定林纾的翻译,曾专门撰文《林纾的翻译》一文,给予很高的评价,甚至认为林纾超越了原著(如对哈葛德作品的翻译)。不光钱钟书,胡适、郑振铎、周作人、郭沫若、陈子展等人,都曾对林纾的翻译予以嘉誉。为什么?问题的关键在于,林纾的翻译达到了严复提出的翻译三标准——信、达、雅,特别是达和雅。他的翻译作品中国读者喜欢读,它们能打动人心——要害在于,林译词能达意、语言流畅、文辞雅致。

林纾的能耐与功劳在于,在把他人口述的他国文学作品转换成中文的时候,他能最大程度地调动自己深厚的中文功底和娴熟的语言运用能力,将原作内容作大致不违其基本旨意的创造性发挥,大大提高文字的可读性,从而使被翻译的作品深深吸引本国读者,达到欲罢不能的程度,以致出现了《茶花女》译本甫一问世,居然风靡神州的现象——“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严复语),从而使他赢得了翻译家的美誉。

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翻译,并非懂某国外语者就可草率从事的工作。在一般人心中,似乎有一种错觉,以为中国人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只要懂该国语言即可,中文无所谓。其实错了,做好一个外译中的文学作品翻译,特别是能使所译的文学作品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和可读性,译者必须兼备对中外两国文字都能熟练驾驭的条件,特别是他的中文功底必须扎实,语言表达必须雅致,否则,翻出来的东西,难以卒读,一定会遭读者唾弃。

这就牵涉到一个眼下大众都很关注的问题了。自从莫言喜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国内似乎掀起了一股热潮,以为莫言之所以会获奖,原因在于翻译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国内像莫言这样水准的

作家,似乎不止一个,为何莫言会捷足先登?根子在于葛浩文的翻译得到了包括马悦然在内的评委们的青睐。于是,人们从中找到了机巧——翻译极其重要。应该承认,葛浩文的翻译确实在莫言获奖的因素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过,不同之处在于,葛浩文精通中英双语,而林纾只精通中文。

如何才能做到翻译的作品能达到如同葛浩文那样的水准呢?莫言是聪明的,他给予葛浩文“随心所欲”的权力,即不必任何请示,随你怎样翻译,这使得葛译在基本不违背原作主旨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考虑了接受国读者的欣赏心理和习惯,从而使所译作品获得了成功,被西方读者尤其是诺贝尔奖评委们首肯。

由于莫言获奖,引来了人们对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外语的高度重视,认为这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环节,于是,有关方面启动了庞大的外译工程。但是,从事这项工程的这些外语人才真正熟悉了解外国人的语言风格、欣赏习惯和审美意识吗?他们能达到葛浩文那样的翻译水准吗?有人建议请一批懂中文的外国人来翻译,但他们的中文能达到林纾或葛浩文的水平吗?还有选择哪些作品外译的问题……



黄金雨·金丝猫(国画)

□苏家杰

C919首飞成功

背后有这些中国高校的身影

参与C919大型客机研发的部分高校名单

学校	主要贡献
清华大学	参与了机头设计、超临界机翼设计、机翼/发动机短舱一体化设计、增压装置设计、后体设计等任务
天津大学	设计座舱环境控制系统,即飞机的“呼吸系统”具体空气分配设计方案的数值仿真和优化设计,让座舱环境更舒适
大连理工大学	为C919尾翼,中央翼复合材料壁板把关
上海交通大学	航空航天学院、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等多个学院为C919大型客机在结构强度等多领域的研发作出贡献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校友企业西子航空作为一级机体结构供应商中唯一的民营企业,为C919大型客机制造了APU舱门和RAT舱门
武汉理工大学	参与设计客机新型材料,让飞机结构减重20%-30%
中南大学	打造了C919机轮刹车系统,为中国商飞独家提供机轮刹车系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学校多个团队为大飞机项目论证、立项、实施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两位院士参与C919首飞技术评审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研制“超细航空级玻璃棉”,用于C919国产大飞机机舱的保温隔音材料,助力完成C919首个静力试验,多位校友参与核心研发工作
西北工业大学	多位师生参与了C919飞机的动力系统、控制系统、结构设计、航电等在内的课题攻关,多个学科团队参与研制大飞机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为C919大飞机“起飞”作出重要贡献。其中,包括C919飞机中央翼复合材料后梁大开口补强设计技术、C919大飞机铝合金机身激光焊接技术及装备研究
复旦大学	航空航天系艾剑良教授、杨爱明副教授、孙刚教授、光源与照明工程系林燕丹教授、孙耀杰教授,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杨卫东教授等承担了其中的相关研究课题
燕山大学	参与了与轴承相关的项目和管路分析和机身运输等工作
合肥工业大学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教授段泽民全程参与了该机型雷电防护方面的研制工作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会长、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校长郝际平教授科研团队完成了大飞机一体化加筋框架设计工作
中国民航大学	为大型客机C919技术方案联合论证、安全性技术评估管理与文件体系、适航工程体系、供应商管理体系和客户服务技术体系等方面提供重要支持
西安交通大学	电气学院姚学玲教授团队:解决了大飞机复合材料、燃油箱等结构件的大电流传导注入和电弧注入的雷电直接效应测试难题,研制开发了复合材料雷电直接效应试验、测试技术的研究和专用试验装备,为C919大飞机的复合材料、燃油箱点火源的验证试验发挥了重要作用 机械工程学院贾书海教授团队:承担了大飞机环控系统噪声性能仿真、设计及优化、大飞机声场复现新技术等研究工作,为大飞机设计完善噪声性能、通过适航取证并获得商业竞争优势作出重要贡献

5月28日,自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的东航MU919航班平安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标志着国产大飞机C919圆满完成首个商业航班飞行。C919首飞成功,标志着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扶摇直上,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民航不再全部依赖国外进口,真正走出了一条自主发展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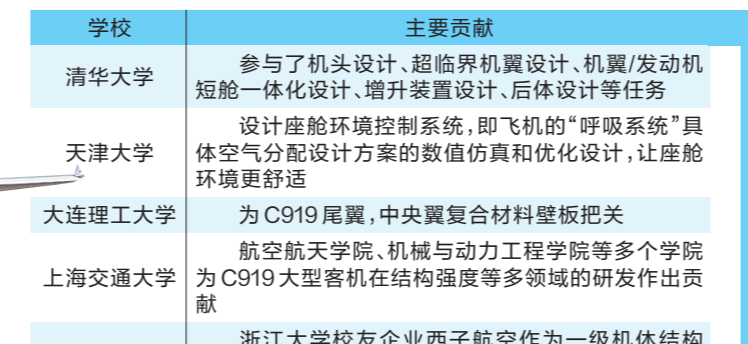
自2008年以来,C919潜心沉淀了15年。回顾C919飞机的研制过程,它承载了我国数十万航空人的蓝天梦。除了国内顶尖的航空科研人员之外,包括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在内的师生也为C919的研发作出了突出贡献。

例如,“举全校之力,全力支持C919!”成了当时西北工业大学在校流传的口号。2008年联合工程队总结大会上,时任常驻上海工作组组长的西工大航空学院李栋教授总结说,作为项目启动的标志事件之一,“联合工程队”的建立和半年的运行意义重大。

同在2008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遴选29名骨干教师加入中国商飞大型客机联合工程队,其中有18名教师集中半年时间在上海参加方案论证工作。参与近150项科研项目,取得了近二十项重要科研成果,为商飞C919的研制提供重要技术支持。

中国高校能在本次国产飞机的研发过程中作出突出贡献,离不开各高校多年来对航空航天人才的悉心培养。多年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勇担“航空报国”使命,为中国商飞输送了大量优秀的航空人才。其中,包括C919总设计师吴光辉、中国商飞公司制造总师姜丽萍等杰出代表。吴光辉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建校70周年发展大会的致辞中表示:“回忆起在南航求学的经历,我仍然记得在机库里上飞机设计课的场景。同学们围坐在飞机旁边,老师现场讲解结构设计,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实践能力的提升,让我至今仍受益匪浅。”

同样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也竭尽全力做好了人才培养。北航成立了大型飞机高级人才培训班,旨在培养大飞机关键领域的紧缺人才。该校坚持“三能力,四素质”的培养理念,至今已培养大飞机行业工程师1000余人,为我国大飞机的研发提供了技术支持。每一次起飞都承载着航天强国的梦想,每一步跨越都刻下中国航天人的追求和信仰。追逐蓝天梦的路上,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航天学子同行,“我觉得学生们当下应当学好课本知识,再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吴光辉说。



图/新华社

来一台堪比春晚的演出,还是打一场水仗?

“六一”该怎么过 应把主动权还给孩子

文/羊城晚报记者 何宁 图/受访者提供

刚刚过去的“六一”,很多学校都花了心思让孩子们过一个开开心心的节日。有学校在可容纳上万人的体育馆举办演出,舞台效果堪比春晚;有学校在操场上搭建了一个巨大的泡沫水池,让孩子们酣畅淋漓地打了一场水仗……记者采访了解到,家长们对“六一”到底要不要搞舞台秀看法不一,有的家长认为,这是给孩子一个展示的平台,“六一”就是要有这样的仪式感让孩子们“秀”;但也有家长认为,“秀”前长时间的彩排折腾孩子也折腾家长,甚至影响正常的教学,让“六一”变味儿了。一年中,属于孩子们自己节日的“六一”到底该怎么过?小羽妈妈告诉记者,小羽六一参加了学校音乐团的表演:“我觉得孩子能在这么好的舞台表演,这会在她的成长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小羽妈妈认为这次展演其实就是各个社团的成果汇演,“学校本身给学生提供了很多社团,每个社团都要排一个节目,看到孩子们的表演,我真觉得很

专业”。不过,也有的家长担心,这会助长学校间的攀比风气。家长李女士表示,那些没有条件在这么好的舞台表演的学校,可能也会暗暗较劲,“毕竟,弄一台这样的晚会需要学校和家长一起配合,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孩子们的各种排演增加了家长的负担。”

许女士的儿子在广州市白云实验学校小学部读一年级,她对学校为学生准备的“六一”活动和礼物表示特别满意。许女士说:“当天晚上儿子回到家可兴奋了,他平时很少跟我说这么多话,但六一那天他不停在说学校这一天的活动,上午学校在操场铺了一个巨大的泡沫水池,一至四年级的孩子们开启了一场‘枪林弹雨,嗨翻一夏’的打水仗活动,孩子们在水的世界里尽情交流、亲近、沟通、释放,体验童年的欢乐。”许女士说,在这么热的天气里,学校让孩子们玩水这个创意特别好,孩子们的开心快乐可想而知。“作为家长,我也被学校的用心和用情

深深感动了。”

许女士说出了不少家长的心声,六一是儿童节,这一天应该把主动权还给孩子,让他们开开心心地度过一年里最轻松自在和最有意思的一天。“一年中有很多上台表演的安排,比如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艺术节、合唱节,很多学校会安排毕业典礼、新年晚会,实在没有必要在六一节也搞一台为大人表演的节目。儿童节就应该有它特殊的仪式感,孩子在这一天能实实在在地得到畅快的欢乐,我觉得就够了。”

专家看法

注重面向人人 哪里都是舞台

“庆祝‘六一’可以有多种形式,每个学校应该以自己的实际出发来设计如何让孩子们过一个快乐开心的‘六一’。”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吴颖民表示,“六一”儿童节是孩子们的专属节日,到底该如何过,没有统一的标准,“每个学校应该根据孩子的实际需求过学校自身的快乐让孩子们过一个开心、快乐或者有积极意义的儿童节。”

不少学校通过各种才艺表演来庆祝“六一”,吴颖民觉得这也是展示孩子们才艺的很好的一个形式,“但是,‘六一’不能成为学校之间互相攀比的舞台,每一所学校都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给孩子们提供适合的舞台去展示自己,只要能展示孩子的才艺,哪里都可以是舞台,班班讲台、学校礼堂、校外的礼堂等都可以。”



一场酣畅淋漓的水仗让孩子们乐开了花